

三星堆遗址自 1931 年发现以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调查、试掘、发掘的研究, 基本上弄清了该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主要内涵。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多次大规模科学发掘, 地层分明, 包含物丰富, 为研究蜀文化的时空关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地层依据。两个祭祀坑的发掘, 出土器物种类和数量之多, 在全国同类遗址的发现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 是商周考古学中一个举世瞩目的重要收获。

三星堆遗址的这些收获, 为我们研究蜀文化的起源, 发展及其演变, 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拟根据三星堆

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 通过与蜀文化分布区域内的同期遗址以及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时代相近、性质相类遗址的比较, 就三星堆遗址的性质作一研究, 作为陈显丹同志《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一文^①的补充, 不足或谬误之处, 请各位方家斧正。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约 11 公里, 最早发现于 1931 年, 1932 年, 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曾作过试掘,^②1956 年, 省文管会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③, 1961 年, 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又作了调查^④, 自 1980 年始至今, 省文管会组织人员陆续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经半个多世纪的调查、发掘, 基本上弄清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该遗址东面到何家院子, 西面到宴家院子, 北面到鸭子河, 南面到三星堆, 面积近 6 平方公里。鸭子河和马牧河分别从遗址的东北、西南部流过。在遗址的东南和西北部还发现两道残断城垣。西城垣残长约 600 米, 东城垣残长约 1000 米。城垣残宽 5 至 20 余米, 残高 2 至 5 米, 东西城垣间距约 1200 米。从发现的残断城垣和当地自然环境分析, 三星

1988.1.15)

①③陈显丹:《神奇的青铜纵目面像》(《广汉信息》1988.2.16)

④龚建平:《纵目人面像为什么有那么长的眼睛》(《四川日报》1988.6)

⑤⑥《华阳国志校注》第 183 页, 第 181 页, 巴蜀书社 1984 年版。

⑦李远国:《试论山海经中的鬼族——兼及蜀族的起源》,《山海经新探》第 188 页。

⑧狩野真祯:《巴蜀古史的再构造》,《四川史学通讯》1983.2 期。

⑨《辞海》第 1859 页。

⑩罗世荣:《龙的起源及演变》,《四川文物》1988.2 期。

⑪⑫⑬⑭《山海经校注》第 230 页, 第 438 页, 第 232 页, 第 314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⑮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 161 页、邓少

琴:《巴蜀史迹探索》第 119 页。

⑯《山海经校注》第 291 页称“都广、广都, 当是一而非二也”, 据《华阳国志·蜀志》云:“广都县, 郡(指成都)西三十里”, 因此, 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双流县一带。

⑰郭发明:《关于“纵目人”的传说》,《文史杂志》1987.1 期。

⑱《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 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第 384 页。

⑲《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87.10)

⑳㉑王红旗:《山海经》试注(选),《山海经新探》第 357、358 页。

㉒《事物的本源》(中译本)第 347 页,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2 年版。

堆遗址当为城址，该城属东西建城墙，南北利用河流作天然屏障而成。城址面积约为1.2平方公里。

川西地区商周时期的古遗址至今已有多处发现，如：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⑤，成都青羊宫遗址⑥，成都羊子山遗址⑦，汉源背后山、麻家山遗址⑧，雅安沙溪坝遗址⑨，成都十二桥遗址⑩等，其中面积以水观音最大，遗址墓葬和居住共存，陶器和铜器同出，但其总体范围也只三万平方米，仅相当于三星堆遗址面积的六百分之一。

整个长江中游的商周时期的遗址更有丰富的出土，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相同者，当首推湖北黄陂盘龙城⑪。整个盘龙城遗址总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只有三星堆遗址的六分之一；其城垣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面积约7万余平方米，也只有三星堆城址的20分之一。

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⑫是长江中游时代早至西周前期，规模最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的古遗址，据王光镐老师论述，其性质为“荆”的都市，但其遗址仅南北长1625米，东西宽约775米，面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三百余平方米，即使加上与鲁台山隔潏水相对文化内涵与鲁台山相同的椅子山遗址（面积三万平方米），两处合计也只得一百三十余万平方米，还不到三星堆遗址的1/4。

中原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更为丰富，其性质与三星堆相同的有：

1、郑州商城⑬。1972年对郑州商城进行钻探考察的结果，获知其夯土城垣周长6960米，其中东墙长约1700米，南墙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三百余万平方米，是三星堆城址的2倍。郑州商城包括城外郊区的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约为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的4倍多。

2、安阳殷墟⑭。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

都，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其范围已经比较清楚了，估计约在24平方公里以上，与郑州早商遗址的规模差不多，也是三星堆遗址面积的4倍。

3、早周都城岐邑近年来被陆续揭露于世，此地发现的有位于凤雏村西周的早周宫室，还有召陈村西周中期偏后的大型宫室。既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又查明了大量西周中晚期的墓葬⑮。遗址总面积达一千五百万平方米，与其相比，三星堆遗址面积只有它总体范围的5分之一，但就西周前其的遗存而言，岐邑的范围还要小于上数。

4、西周早期的燕国中心已在北京西南郊的琉璃河地区探明⑯。经考古工作者反复查勘，可知其总体范围约为三百五十万平方米，仅比三星堆遗址面积略大。

上述比较可知：三星堆遗址规模之大，就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而言，在整个蜀文化分布区域内乃至长江中游的同期遗址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与同期中原地区的著名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以及早周都邑岐邑相比，其总体范围虽然较上述为小，但其城垣面积却相差不多，说明了这是一处何等重要的商周遗存，其城址已非一般城址可比拟，反映出该遗址应是当时人们聚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二

三星堆遗址不仅规模大，出土遗物丰富，而且还发现有房屋基址、墓葬、祭祀坑等多种遗迹，通过将它们与上述遗址同类遗迹的比较对于我们认识三星堆遗址的性质也有较大的帮助。

三星堆遗址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房基十八座⑰，打破、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后代扰乱也较严重，但从柱洞和沟槽的排列，仍可看出一些房基的布局和大体结构。它们均为地面木构建筑，平面绝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形，仅两座为圆形，面积一般在14—35平

方米之间，个别达60平方米^⑩。与川西和长江中游以及中原地区同类遗址相比，其面积虽与它们的宫殿类基址的面积相去甚远，但却与中小型建筑不论是平面布局还是建筑方法以及面积的大小都基本相同。从而可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建筑基址不是该遗址的宫殿基址，而应该是一般奴隶主贵族或是贫民的房子，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基址应大于上数，其大小应与城址的规模相适应。

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中的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1986年7月至9月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青铜、玉、石礼器等，这类性质的遗迹，其出土器物种类、数量之多，在全国皆属首次发现。通过对这两个祭祀坑性质与出土器物的分析以及与其它地区同类遗迹的比较研究，我们对在此进行祭祀的主人身分和对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都将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关于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的性质，已有专门文章进行研究^⑪，本文不再赘述。就目前笔者所见的材料，其它地区与之性质相似的遗迹，以殷墟乙组基址中部的乙七、乙八^⑫基址和殷墟王陵东区发现的一片大规模祭祀坑^⑬以及在江苏丘湾发现的一处人祭遗存^⑭最为典型，上述三处祭祀遗存的性质，已有专门文章加以论述^⑮，但是，不论是用于祭祀的殷墟乙七、乙八宗庙遗址，还是晚商帝王祭祀其祖先的殷墟王陵东区的重要祭坛以及用于社祭的江苏铜山丘湾的人祭遗存，其祭品的种类与数量，与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相比，都相去甚远。虽然上述三处祭祀遗存的性质与三星堆祭祀遗存的性质之间存在不同之处，这样简单的类比，难免有失偏颇，但即使是这样有失偏颇的比较，我们都不难得出如下一个结论：三星堆祭祀遗存的主人身分，在他的统治区域内与商帝国在他的统治区域内的身分是相当的，他应该是古蜀王朝的统治者之一。

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紧相毗邻，二者的年代也大体上次第相应。发现的十八座房基也基本上集中一处，虽然与发现的四座墓葬同在一地，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迭压打破关系，可知是时代差异所致。由于目前工作的局限，虽然对于城址的布局还不十分清楚，但祭祀场所与居住基址分置于不同的位置，体现出整个城址在区划上具有明显的整体性。

三

综上所述，无论从三星堆遗址的规模还是从祭祀坑的性质和出土遗物所反映的主人身分等级来看，三星堆遗址的性质，正如陈显丹同志在《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一文中所述，是三千多年前蜀国的都城。

注 释：

①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四期。

② 简报见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说文月刊》3卷7期及“协大”学报第一期（1949年）。

③ 《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④ 《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⑤ 《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⑥ 《成都青羊宫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⑦ 《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简报》，《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⑧ 资料藏汉源县文化馆。

⑨ 资料尚在整理中。

⑩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⑪ 《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⑫ 《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2期。

⑬ 《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⑭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⑮ 《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

⑯ 《北京附近发现的西非奴隶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⑰ 《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